



直面经济数字化 国际税收改革真问题： 利润分配新规则的重构、解构与建构*

刘奇超 曹明星 王晶晶

内容摘要：利润分配新规则的确定是当前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研究中关注点，着眼于逻辑上看，用汇聚各方理论共识因素形成的“市场管辖区”概念来主张新征税权的方式，有助于搁置分歧、探寻实质性解决方案。从政策设计上看，修订的剩余利润分配法、部分分配法与其子分销的方法均或多或少突破了独

制度性保障。通过全球在实质性简化措施的探索与细节性制度设计的共商方面作出的进一步努力，必将从根本上

摘要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跨国企业争先恐后地将经营重心向中国转移，这为我国国际税收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国际税收新问题，制定有效实施利润分配新规则的制度性保障，通过全球在实质性简化措施的探索与细节性制度设计的共商方面作出的进一步努力，必将从根本上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税收新问题。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深刻重塑世界经济，改变人类社会面貌。在此背景下，各方为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寻新增长动能与发展之路、共治新征税权划分与剩余 BEPS 问题，围绕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改革的“双支柱”提案¹，掀起了一场主题鲜明、时间

改革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亟待研究解决。

一、新思路：思维逻辑的总体重构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尽管 OECD 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布的《旨在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

* 和中国法学会 2018 年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互联网经济下的税收问题研究：以平台为中心”（课题编号：CLS（2018）0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经济数字化税收改革”次支柱“提案”，是指以“修订的利润分配和联结度规则”为第一支柱和以“全球反税基侵蚀提案”为第二支柱的改革提案。



划中提及多项新的政策细节，但始终不外乎是以看得见的其税收管辖权？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共识》将利

提出的“清晰而充分、多层次的实际利益需求。”
以政府治理的角度看，国家已吹响六月《十项行动方案》，然而未有简化涉税流程，降低企业成本的实质性进展。

成为现代高级生产方式的三足和未来现代化后期，土耳其国家分外重视整体繁荣的实现和增长。同时，基于悠久的民族传统来说，土耳其不能错过这一发展机遇。建立在ERP经营性核算基础上“双赢机制”的协调机制，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和以印度、哥伦比亚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之间，提供了一次共同探讨传统理论基础创新与新制度规则供给之间的公平对话。其结果会让各方在同一思维逻辑框架内形成对未来的包容性规则和规则的审慎性选择。

从理论融合的视角看，《共识》为业界留白了探寻如何在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之间、在劳动一元价值论与要素多元价值论之间找到对用户参与和数据主权（隐私）价值的理论支撑。赋予了劳动价值属性，经济活动驱动得容易，但对劳动者的激励却需要时间。有了用户参与，数据主权（隐私）价值才能发挥出来，从而驱动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并形成良性反馈。但是，为动员“第一支柱”协同推进，《共识》巧妙地调整了用户参与、数据主权与资产归属的权重。《共识》前三项措施主要侧重分配，体现了由根源三对理论之父所推崇的“劳动管理区”概念来重新诠释劳资关系。实践证明，对劳动的属性划分差异不一定会对“第一支柱”带来其他内容的诱发产生显著影响。另外，由斯托克斯和布雷特所著方法，确定某种研究范式的思路转换为全球改革赢得了时间。

从政策创新的视角看，受新征税权约束的利润数、损益分利和综合所得原则的制衡机制，重振其“如何通过企业内部的重新划分来为企业生产赋能”。如何区分集团内部不同所有者无形资产之间的贡献，以及这些所有者各自承担的行政责任？如何在新征税权行将取消对整体改革就五项根本（或可追溯到）有利资产进行分类的情况下，对新法规定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首先，要识别“企业核算”和“企业经营”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核算指广义的、横向的、统一的、独立的财务报告，而企业在提供服务时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或因在提供服务同时对其他企业提供了服务（如广告）。

即公私现行有情分配交易的某点点，从而未有简化涉

议（包括偏离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以确保合规和

内的利润在实体之间按照规则在跨国集团的不同部门之间分配。同时，规范双倍余额。

二、解决方案：合作共治与规则统一

（一）修订的剩余利润分配法

总的来看，修订的剩余利润分配法（RPS）的原则架构选择该方法是要将集团作为一个整体适用，还是要单独考虑不同的业务线和地理区域加以适用这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和设计的。

1. 确定应分配的总利润

若仅从会计角度看，在所有情况下，总利润的确定将以相关主体账户上记录的非经常性项目前的营业收入为准，而并不考虑“净利润”或“净收入”等概念。小企业通常会将其收入直接归类于净利润，而大企业则可能会将其收入归类于收入、毛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或营业外收入。企业设立收入权益的概念，有传递一步骤案、五步法或双重扣除，需要重点关注其对现金流。

第一，纳税居民是否位于高税国。代税地吸金能力：为避免从低税地向高税地转移利润，防止无现金高税率国家滥征企业所得税。以合营企业数据作为计算的基础，则该方法最为简单。但现实是，目前全球主要采用的是《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法》（或称《OECD范本》或《OECD模式》）。

告准则》（IFRS）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即便使用同一准则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确定税率、税率、税率适用对象、税率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此外，可考虑使用零税率在租售性地区的条件下将税率降低至零税率（或可参照《欧盟企业所得税指令》，至于税率具体调整办法则需要考虑企业的实际经营地和企业所在地的法律规定。当然，如果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多



— 该方法是可行的，不过，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企业。

财务会计与税收规则之间的差异，如同收入时间安排有关的规则。

第二，评估好适用哪种方法。若采用集团范围法，须将来源于跨国集团不同实体的收入视为单一企业所赚取的。但此法可能导致在后续环节难以确定在哪个

规利润属于新征税权范围，以及哪些活动在范围外产生了常规利润。对此，可能需要扩大税务机关获取纳税人信息的权力。

第二，使用简化方法。事实上，简化方法并不寻求将常规活动和非常规活动区分开来，但为确定非常

是单一实体还是多个实体，进而依法计算合并利润。相比而言，综合性实体法也会出现类似集团范围法的实施所带来的问题，但相对涉及调整的实体数量与税收管辖区的范围较小³。

2. 剔除常规利润

通常，选择如何剔除常规利润，要根据 MRPS 确定总利润的方法来确定。对此，《共识》明确了两种方案。

第一，使用当前的转让定价规则。一种可能的方

致计算出的非常规利润数额超过按转让定价方法所能确定的利润，则会引发重大争议。(2) 制定适用于全部常规销售与分销活动的安全港规则。探索将该方法建立在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BEPS 多边公约等现有成果之上，采用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的方式予以确认。同时，该方法的实施可同多边风险评估与保证程序相结合，借鉴《国际合规保证计划》(ICAP)⁷ 经验，推动有关进程。

如果选择转让定价方法，企业在制定定价后，不能享受第三支柱的优惠。二是选择综合实体法为有效且增加利益化。同时在新征税权的转让定价中保留商品定价权，从而确保对企业的定价权与定价权分离，一个实体定价，

由另一个实体在新征税权部分。

第一，选择转让定价方法为最佳选择合理性。成本化定价是一种根据于企业在新征税权范围内所产生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成本来定价的方法。以这种方式定价能够

约束的非常规利润数额。同时，如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决定了一个实体的利润是否可归为非常规利润，就全局而言新征税权下两个企业的利润是否一致了。

另外，公司价值损益活动是其价值创造空间。此外，若常规模算是以整个资产组合为基准来定价，完全没有涵盖的服务机构在执行上将无法执行定价权，税务机关

计算非常规利润的方法。该方法将使用成本作为一种相对于其他活动的代理指标，来确定新征税权所涵盖的活动及其相对贡献。它不会根据新征税权所针对的活动或资产的相对价值，首先，飞速增长管理重视的是资产的分值。事实上，正如在《协定书交易利得定价指南》(以下简称“交易指南”)⁸ 中已多次

3 通常企业必须考虑法律差异，这可能影响某些企业的定价权。必须统一企业报告表的修订并结合企业。

4 在一些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发现其定价权受到限制，更易地在第三方反洗钱监管机构设立中心或通过下属机构，更易地获得中心定价权。

5 在使用利润分配法中的贡献分析时，可能无法清楚地确定利润分配的哪一部分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

6 对于有形资产采用普遍加成的方法，或要依托第二支柱的反避税规则来限制可能发生的税收筹划行为。

7 OECD, OECD International Compliance Assurance Programme[EB/OL]. <http://www.oecd.org/tax/forum-on-tax-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compliance-assurance-programme.htm>, 2019-06-25.

8 OECD Revised Guida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actional Profit



到使用基于成本的方法来分配非常规利润的方式。但由于不同类型支出的风险是不同的，成本因素并不总是

同比例，允许分配更高比例的非常规利润给那些与新征税权范围密切相关的活动和资产的所在地，是一种

有观点提出要通过比较支出中不同类型的“资本化价

问题在于，即便改革对不同行业主张使用不同的百分

给予简化原则，为避免对跨国集团采用基于非常规分

额的可能。

行，对物权和金融资产等不同性质的支出将采取

不同的方法。在新税制下，对于非常规利润的计算

，将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研发、广告、

专利、版权、商标、著作权、土地、建筑物、存货、长期投资、

以及租赁费、利息、股息、红利、股权转让费、

以及工资、薪金、奖金、福利、以及职工福利、

以及房屋、设备、工具、机器、以及办公用具、

以及车辆、船舶、飞机、以及通信设施、

以及建筑物、以及在建工程、以及在建工程、

以及在建工程、以及在建工程、以及在建工程、

Royalty Refer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nd Valuation Standard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2016,25:76-87.

的方式加以确定。在分配利润时，依靠简单的用户数量作为分配因素，可能会忽略不同用户所产生的价值差异。例如，创建内容的用户比那些只查看内容的用户有更大的价值。

第三、优先选择法：以用户可参与度为第一

收管辖区内发生的或特定的成本作为相关贡献的代理因素。例如，开展营销活动产生的成本或为提供给用户免费在线服务而支出的成本。

(二) 部分分配法

从《共识》看，部分分配法的实施权重占

一半以上的收入和利润。但《共识》也指出，对于行业系数是采用预先确定的分配公式使用不变系数，还是针对行业细分采用可变系数。

从理论上讲，不变系数较为武断，它不考虑市场状

况、行业变化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交通运输业的固定

成本高，但企业对用户的吸引力和客户忠诚度较低，

实施缺乏联系。而可变系数能使利润的分配更好地反映跨国集团的潜在经济状况，但它也会增加合规与管理的成本，给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带来不确定性。从实践上看，采用可变系数是当前全球主要发展趋势。在印度中央

吉特税局 2010 年 1 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修正所得税法

第 10 章第 10 款，即企业所得税 (EAT) 的实施阶段占

在具体规定及分配方法上，《共识》选取两种方法，第一，使用现行的比率法。事实上，分配

利润时通常会将可变系数分配到各用户，除净利润之外，也可由非居民账目上的营业利润或息税折

扣摊销前利润 (EBITDA) 计算得出。但使用现行比率法计算很困难，可能会为跨国集团创造采用间接税收型付款或有限风险分销商 (LRDs) 结构等方式实施税收筹划

的机会。特别是，当分销实体在当归属收管辖区内的

企业，如银行、保险等，其已实现的利润或未实现的利润量，均可能显著地被忽视。而且，类似于往年曾经提出的“双重扣减”或“双重抵扣”，即同时扣除利息/股息/红利和折旧或摊销，从而降低企业的应纳税额。这可能使

户强度的企业，设定分配给用户 20% 的权重，给雇员和资产各 25% 的权重，给销售同事 20% 的权重。因此

归属于任一涉及经营的利润，来源于印度的利润 $= [0.3 \times S_I / S_T + (0.125 \times N_I / N_T) + (0.125 \times W_I / W_T) + (0.25 \times A_I / 3 \times A_T)] + 0.2^{13}$ 。

(三) 基于分组的方法

相比之下，目前各方对于 FA 第一步“选择分配要件”法，结合《共识》看，需从三个角度理解和运用 DRA。

首先，根据《共识》，DRA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收入类，需要根据收入的稳定性来选择；二是支出类，可直接使用，也可作为模式法双因素的参考指标。其中，分配系数的设置权重就不再行业受限制地以不变方式

设置，而是根据收入的稳定性不同，因此，企业在选择 DRA 时，应根据收入的稳定性不同，选择不同的分配系数。在收入稳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分配系数的设置权重应放在营业收入上，主营业务收入又关更稳定的情况。通常，该指标的权重应反映为主营业务收入的分段情况和经营

稳定性。其次，根据《共识》，DRA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收入类，需要根据收入的稳定性来选择；二是支出类，可直接使用，也可作为模式法双因素的参考指标。其中，分配系数的设置权重就不再行业受限制地以不变方式

设置，而是根据收入的稳定性不同，因此，企业在选择 DRA 时，应根据收入的稳定性不同，选择不同的分配系数。

14. 这种营业利润可按年计算，也可选择按数年（如 3 年）平均计算和/或英国内确定营业利润，以抑制年度业绩产生的波动。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那么，如果某实体直接向客户销售其产品或服务，即由客户直接购买，应按增值税率计算税额，即属于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如果该类数据被某些企业认为需要单独归集核算，公司（或者机构）应当予以准许；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以增值税为基准来计算利润的。

当然把利润的盈利率、利润率、贡献度等应用于相

关的业务单元上，将带来很多问题。虽然增值税的税率与所得税率是一致的，但是增值税的计税基础与所得税的计税基础是不同的，对于某些业务而言，增值税的税率可能比所得税的税率要高，从而导致企业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缴纳更多的增值税。因此，企业在选择是否将增值税作为利润核算的基准时，需要慎重考虑。

是低还是高回报率，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是一个

数字上加多少，譬如，一家跨国集团的整体税率为12.5%，那么，2.5%的增值税率将上调0.5%，因此，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整体税负，所以必须对增值税进行调整。

另外影响利润率的因素还有企业的资源分布情况、生产成本等因素，也需要综合考虑。因此，企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于市场国内的客户或用户进行远程销售所产生的收入乘以一个核定的基准利润率来确定。借鉴SEP提案的设计思路，只有当实体在市场国构成SEP后才能使用利润分配法；而在DBA中，由于不区分实体是否构成SEP，相对而言，对于市场管辖的领土使用利润分配法

相对较为现实，但如果考虑应对和挑战的避税计算下调整的回扣，则计算出的增值税率可能是负数。相比而言，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通过直接投资设立子公司，再使用一个实体部分，或者通过多头投资设立分公司，再使用一个实体部分，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增值税的双重征税，从而降低企业的税负。

三、新观察：配套规则的审慎建构

(一) 开发使用业务线与区域细分

从理论上讲，无论新征税权的利润分配规则如何设计，对于不同行业细分、不同部门是不适用相同的

防止因少量分销活动而造成税负“悬崖效应”。

主张将销售收入作为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分配新征

税的收入来源，从而实现对不同收入类型的统一处理方法。然而投资者为维护以系统化运营为主的模式下的市场份额和经营资源的稳定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方面实则更强。第二，从宏观运用的角度看，如果企业作为一种简单的利润分配方法，这可能会人为地抑制企

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对于传统风向标的零售业与高附加值的云计算业等新兴行业，新征税权的分配规则更应由行业而定。同时新的分配规则有利于零售业中的大型企业突围，而不利于云计算业

⑤ 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时，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可能会被取消资格。

⑥ 例如亚马逊。

⑦ 生产环节的利润较低，因此企业很乐意。

⑧ 云计算指包括计算、存储、软件和数据管理以及共享基础设施的云服务，通常在企业内部完成商品生产。因此，在宏观政策上，用户可以通过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直接获得服务。

跨国集团的经营收入是否应纳入新征税权的征税范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而此前，无论是出于谨慎、简化、跨国集团的复杂性，利润率可能是主要监管举措的高成本和效率等综合考虑，企业完全忽略风险，至此，税务部门必须更加审慎地

通过更细致的监管，例如，为改善生产上痕迹，企业正在开发软件系统，是属于在新规范围内相关活动或资产变化，还是属于在规则之外的灰色地带，要

异，制定差别化的规制政策可能更为妥当，但这也会带来重要的合规问题。譬如，跨国集团通常不按业务部门准备细分账目，税务机关不得不使用纳税人为缴纳税款而临时性准备的业务部门财务数据，且这些数据可能很难审计。又如，区域销售数据不易获取，但

索多元化指标判定因素。如使用 MAU、用户 / 客户投入的价值或数量、第二方分销商在市场管辖区内的销售产品的收入等指标。但是，若只利用这些因素来确定最终范围，可能会导致新征税权的规则范围较窄。

第二、预先定义商业模式的类型。事实上，欧盟

在《关于跨国企业利润分配和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项目的报告》中指出，企业商业模式的类型对新征税权的适用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商业模式，识别出可能被新征税权覆盖的收入来源，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对于企业而言，商业模式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传统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获得收入；第二类是平台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第三方提供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使客户能够通过该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第三类是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同时向其他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使客户能够通过该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

对于企业而言，商业模式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传统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获得收入；第二类是平台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第三方提供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使客户能够通过该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第三类是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同时向其他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使客户能够通过该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

对于企业而言，商业模式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传统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获得收入；第二类是平台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第三方提供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使客户能够通过该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第三类是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即企业通过向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同时向其他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使客户能够通过该基础设施、数据、工具等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

如以限制、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方法：

1. 基于业务性质的限制

第一，多重流转环节。该方法的逻辑在于要求企业符合某一标准的企业排除在外。首先，这种测试法可使其工业企业进行的活动进行积极测试，或其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有设计的业务类型，从而限制政策范围。

第三、业务额方法。一般认为，该方法更实际地

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清晰。例如，企业在集团内某些业务活动中，如果收入或支出金额较小，那么该业务活动就可能不会被纳入新征税权的范围。然而，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它们可能在某些业务活动中产生大量的收入或支出，但这些收入或支出金额较小，因此，这些企业可能无法通过该方法进行积极测试。

以确定等原因而由，将 B2B 业务排除在政策规制范围之外。但是，这种广泛的排除可能会造成政策漏洞。又如，积极测试可将某些支出与收入的比率，或某些支出与总支出的比率作为衡量标准，并可实际运用到运营免费平台、广告或经营远程销售的支出因素的判

采用该方法，既可解决某跨国集团的某些经营活动会超出新征税权范围内业务活动定义的情形，又能兼容适用安全港排除规则。但是，集团内细分不同业务线将进一步增加管理难度与合规成本。

2. 基于规模的限制

征税权规制的对象。例如，将农产品和矿产品（如钢铁、

业有能力利用现行国际税收框架中的政策漏洞和错配



规则一：通过税收筹划的方式降低市场利润。同时，

一个跨国集团选择一个名义上的总部和三个分支，且只

由已签署避税地承诺的第三国（或地区）进行申报，从而永久地改变其在该地的纳税义务。这样，跨国集团就可以通过在避税地设立一个或多个子公司，从而将收入转移至避税地，从而降低整体的税率。

7.5亿欧元的跨国集团，不适用于市场国年收入低于特定门槛的跨国集团。为进一步完善政策适用的范围，

一些损失将通过限制未来几年分配给其他税收管辖区的非常规利润来实现“追补”。对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

而言，相关条款从增加集团首次享受豁免之日起第一

年到第15年，每年可享受10%的利息收入，之后逐年递减。

合与数据被纳入跨国企业的所得税申报表，但仅限于企业集团内部。

（二）多渠道识别为客户提供

差异及通过单笔交易向其征税困难：

第二，建立更加综合的所得税申报制度。对跨国企业来说，这将有助于避免因不同国家的税务机关对同一笔交易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冲突。

（三）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跨境征管机制：

通过加强信息共享、简化跨境征管流程，提高效率。

方面仍存在许多障碍，特别是就“首得人”认定

一家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之间如何划分收入的问题

而言，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各国根据各自国情

和法律，对收入归属地有不同的规定，从而导致了税制的复杂化。

其次，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如何确定其在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及如何根据这些活动进行合理的避税，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使用资本和劳务两种方式，“无论交易是否涉及不同类型或形式，都应以同样的方式

处理”，并遵守相应的规定；二、加强风险管理。加强跨国企业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与税负相匹配，即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或将其资金分出为上缴，或再投资于有之；五、加强跨境业务的合规性监控/税收管理区，实施亏损“圈离”制度。

适用”。同时，改革应就该方案的实施制定详细规则。例如，一家跨国集团可能应该在显示亏损的税收管辖区提交纳税申报表，甚至在该集团产生利润之前就应提交纳税申报表。特别是在产生盈利之前的那些年，

综上所述，尽管《共识》提供了一份菜单式的政策选择框架供各方研究，但其中蕴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十分凸显。可以说，全球新利润分配新规则的改革达成共识，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该集团应该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申报并主张亏损？这些规则亟待明确。

（四）对中企走出去提出新要求



-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R]. Paris:OECD, 2019.
- [2] KPMG, PwC, BlaBlaCar, Johnson & Johnson, P&G, etc. Comments on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on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ed Economy [R]. Paris:OECD, 2019.
- Tax Proposals[J]. Tax Notes International, 2019(347):502-525.
- [5] 曹明星, 杜建伟. 求本溯源 存异求同: 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的最新发展与完善路径 [J]. 国际税收, 2019(1): 31-34.
- [6] 刘奇超. 经济数字化税收政策体系建构的新观察与新思路: 一个总体分析框架 [J]. 国际税收, 2019(3): 25-33.

———
一个总体框架———

Facing the Ke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 in Economic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New Profit Allocation Rules

赵薇薇, 马晓春 & 王锐强

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new profit allocation rules is the key, difficult and hot issue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under economic digitaliz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new profit allocation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it allocation principles, profit allocation methods and profit allocation system design. It also proposes the specific treatment of cross-border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new profit allocation rul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rough further efforts made by the whole world in the extension of substantive simplification measur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detailed system design, this problem will be fundamentally solv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rofit allocation; Standard approach; profit allocation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profit allocation rules;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作者简介: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心

上海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 赵薇薇)